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

主编 陈春声 罗 勇 王 东

白垩乡的故事

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肖文评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垩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 肖文评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4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12096 - 6

I. ①白… II. ①肖… III. ①客家人—村史—大埔县 IV. ①K29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0912 号

BAIHOUXIANG DE GUSHI: DIYUSHI MAILUO XIA DE XIANGCUN SHEHUI JIANGOU

白垩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肖文评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肖风华

出版策划：钟菱

责任编辑：钟菱 王红星 李春龙

插图：曹知博

印章篆刻：林清书

装帧设计：吴长乐 金彤

责任技编：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28.75 字数：490千

版次：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5240

ISBN 978-7-218-12096-6



9 787218 120966 >

《客家学术研究丛书》总序

清嘉庆十三年（1808），执掌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受广东东莞、博罗一带“土客械斗”的触动，招集院内诸生，讲述客家源流及其语言文化。徐氏的讲述，后经门人整理，以《丰湖杂记》为名，收录在《和平徐氏族谱》之中。^①在客家研究的学术史上，徐氏的这份讲述，“虽文仅一千余言，然颇能简明得要，且为最先提述客家源流问题的作品”^②，故而一直被视为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先声。

以《丰湖杂记》为起始，客家研究已走过200多年的历程。200多年来，围绕着客家历史文化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可谓丰富而又饱满。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纷纷介入，在多学科交叉与整合背景下的“客家学”建构，正在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实践。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在200多年来的客家研究进程中，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前者在继承和发展徐旭曾以来客家籍传统文人士大夫对于乡土历史与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的同时，又立足于现代的学术规范，“以科学之方法，为客观之论述”^③，从而首次以严谨的学术理路，对客家历史与文化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厘定，并得出了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系统分明的“民系”（或“支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客家是由于

① 详请参阅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香港：中国学社，1965，第297～2199页。

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社，1933，第2页。

③ 朱希祖：《客家研究导论序》，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朱序，第1页。

历史上多次移民运动而引发的北方汉人南迁的产物等一系列重要结论。至于《客家源流考》，则主要是以客家谱牒文献为基础，进一步夯实前书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继罗香林先生之后，海内外学术界又推出了大量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不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类后续的成果除了拾遗补缺之外，总体上都没有超过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书的水平。一直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众多社会科学学科的加入，特别是随中国改革开放而来的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日趋频繁和深入，反思罗香林先生以来的客家研究传统，突破已有的以历史源流考证、方言特征描述和民俗事象举证为旨归的有限格局，一种全新的客家研究范式才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正因为如此，在学术史的分期上，我们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客家研究，笼统地归入由罗香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就研究范式而言，这一传统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从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出发，通过梳理北方汉族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来辨析客家的渊远流变，再对客家的民族归属问题进行剖判；其二，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主要是以零星的正史材料和地方志文献为经，以大量的客家谱牒文献为纬，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文献铺陈方式，“再现”客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汉族移民史”范式主导下的客家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承传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但是，从学理的层面看，这一研究模式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不足。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宏观的“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同一部汉人南迁史背景下南方汉族又分化成不同方言文化群体的这一重要事实。众所周知，在今天的南方汉族人群中，不仅有客家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还有吴、湘、赣、闽、粤等诸多汉语方言文化群。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在北方汉人南迁的这一共同背景下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这一事实表明，仅仅从汉人南迁这个单一的移民史维度，是无法彻底厘清客家之所以成为客家、其他南方汉语方言群体之所以不同于客家的历史文化缘由。其次，这一研究路径在整体上漠视了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片毗邻区域（笔者称之为“赣闽粤边”）历史文化景观的独特性，漠视了该区域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与客家形成及发展之间的种种内在关联。数十年来，在“汉族移民史”的研究理路影响下，作为客家赖以生存与发展地理基础的“赣闽粤边”，一直以来只是一个“配角”，是接纳北方人口南迁的“容器”，是承载随北方人口南下而来的中原文化意识、文化观念和文化事物的“集装箱”。在这种“赣闽粤边”完全“不在场”的叙事模式下，客家就是一群“中原衣冠”辗转南迁、“雅不欲与土人相混处”^①的“中原音韵”承传者、“诗书礼乐”传播者和“爱国保族思想”的勇敢实践者。^②至于赣闽粤边区域内部的族群关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互动等各种因素，对客家这个特定的区域性语言文化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叙事模式之下，则一概阙如。

就主要研究策略来看，“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主要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宏观发展进程，经由对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北方汉族人口南迁过程的梳理，来厘清客家人的来龙去脉，一方面借以证明客家是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彰显客家人根在中原和忠义爱国的群体特性。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研究的核心关怀，一方面是力图化解自19世纪以来华南地区日益强化的客家人与周边其他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与紧张，另一方面又与20世纪初叶以来华南地区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相呼应。在这样的研究策略和核心关怀指导下，作为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晋室南渡、安史之乱、宋金对峙、蒙元南下以及清军入关等等，遂成为理解客家起源与发展的几个最主要的历史情节。相应地，所谓“中原衣冠”“义不帝秦”“诗礼传家”“崇文重教”等，便成为客

^① 徐旭曾：《丰湖杂记》，罗香林编：《客家史料汇编》，第299页。

^② 详请参阅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四至第八章。

家人或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围绕着客家历史与文化所建构的一整套叙事模式，包括在这一叙事模式之下所积淀起来的有关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各种知识，都与上述这套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纷纷介入，特别是经过中国史研究从原先的“宏大叙事”向中观层面的“区域史”路向的转变，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开始了对罗香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与检讨。正是在这一反思与检讨的过程中，客家研究进入了学术上的“突破”期。

这一时期所谓的“突破”，尽管体现在问题意识、研究理路、概念工具乃至具体方法等各个不同的面向，但由此前“汉族移民史”的宏大叙事模式，向“区域社会史”叙事模式的转向，则是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尽管就严格的意义而言，最近二三十年来所问世的客家研究成果，丰富而又驳杂，以至于我们很难用某种统一的理论范式来加以归类；但是，把客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以及客家文化的类型特征放置于特定的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之中，从区域社会的发展过程、人口流动、族群关系、生计类型、贸易网络、区域互动等各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客家这个特定的方言文化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辨析客家文化与周边其他区域文化的异同，则是这一时期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取向。在“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下，客家这个地域性的语言文化群体，就不再是一群行色匆匆的北方来客（及其后裔），而是赣闽粤边地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研究的整体理路，是以赣闽粤边这一特定的地理范围及其相邻区域为基础，揭示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构成区域历史或区域文化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作用。它重在从区域内部的人地关系、族群关系以及该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互动过程中，来理解地域社会的类型及其特征。与以往那种宏观的汉族移民史研究理路相比，这一研究路径所开凿出的诸多研究课题，所发展出的各种研究方法，所凝练出的各种理论诠释，不仅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

于客家历史与文化的认知，而且为推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向纵深的发展提供了丰沛的学术资源。

正是基于对百余年来客家研究学术史的以上认识，我们在编辑这套“客家学术研究丛书”时，把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作为整套丛书的第一种。这样的结构安排，既是对百余年来客家研究学术史的尊重，更是对罗香林先生这份学术遗产的格外珍视。而整套丛书所希望重点呈现的，自然是最近若干年来客家研究界所贡献的一系列最新成果。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客家研究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是一项世界性的学术事业。从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到当代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界，关于客家人、客家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一直就未曾中断过。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客家研究的发展与“突破”过程中，一些来自于海外的学术成果，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着手编辑这套丛书时，我们也曾考虑将海外学术界的重要成果加以收录。然而，由于这些成果大都是以外文出版或发表的，短时间内很难一一译成中文。故而，除梁肇庭先生的著作外，其他的成果暂时都未能编入丛书。这当然是非常遗憾的。我们殷切地期待译界朋友能尽快地将这些成果系统地译过来，一方面以嘉惠整个学林，另一方面也让这套丛书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和饱满。

是为序。

王 东

2018年2月1日

序 言

许怀林

读完了肖文评博士的《白垵乡^①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我的一个心愿得到满足，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份实事求是的、细致解剖客家基地大埔县的一个乡村的学术报告，它详尽地展示了明清时期粤东北地区的落后乡村发展进步的精彩画面。作者带你走进一个接一个的家族世界，感受他们起伏不定的人生经历，随着“梗民”“乡豪”向税户、“士绅”的转变，乡村也从“化外”进入“化内”，成为儒学礼仪之乡。顺着生活的逻辑顺序而来，得到理所当然的历史结果，欣喜地为之点头折服。

从1990年以来，看到过不少关于客家的著作，例皆大而全式的宏观纵论，地域涉及多个省州府县，时间贯穿上下古今，就是不深入一个乡镇中去作实地考察，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经历，探寻乡村社会的结构与变迁。那些看似涵盖全局、普遍适用的综合结论，总让人觉得浮在半空，难免不生疑窦：我县本乡真的是这样吗？作者们的说法教导民众如此这般看待历史，可是先辈们的蹒跚足迹，却很难和那些说法合辙。

为什么这本《白垵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能避免空论泛观之弊？因为作者出门时没有带着先验的框架，进入研究领域是抱着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其研究途径是：首先，以白垵乡村为考察对象，在传统史学的时间维度基础上加入具体的空间维度，历史过程在时空连接之

^① 白垵：民国以后更名为百侯。

后就更具有认知的可操作性。其次，把村落社区当作社会的“缩影”，从社区中去理解大的社会和制度的变化，在宏观的背景中去解读社区生活。零散而片断的资料被放到社会体系中去理解，就恢复了活力，显示出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再次，细心做田野调查，坚持实地“体验”，“走向历史现场”。在与村民的深度访谈中，获得古人古事的民间遗存——故事与传说，从而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文献背后的“故事”因之明朗，从而真正读懂文献，认清乡村社会全貌。

在具体方法上，肖文评博士借鉴当前“华南研究”中对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经验，整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广泛收集、整理民间文献的同时，虚心进行访谈。把文献、口碑和实地考察的结合，对社区进行深入的总体评估；重点放在家族、教育、国家权力在乡村中的表达、民间信仰、市场网络、社会结构等方面。在过程“再现”中作结构分析，使一个村落处于区域整体的关怀之中。对文本的解读，坚持从当地的历史实际和当地人的意识出发。看清了当地的社会历史现象，才能发现和阐释其历史意义。

鉴于白堊是个多元的有长期历史的乡村，肖博士参考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关于“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及与之相应的“结构”“局势”和“事件”的研究要领，既从当地人的处境出发，进行“同情之理解”，又有自己的研究视角与评议。他深入发掘地方文献，看重当地人士在当下时间的作品的直观性、真实性，尤其是那些当事人的记录，对解读乡村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始价值。在此同时，又注意到访谈对象由于文化程度、地域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提供的信息比较芜杂，带有片面性，需要认真的考辨与梳理，鉴别其真伪，分辨其价值，避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资料鉴别工作之重要，不会逊于对资料的占有。凭借不可信的资料作出的判断，就像凭假证定罪，结果必然是颠倒是非。所以，资料的鉴别是否得当，乃是对研究者的学风学识、专业基础与研究能力的检验。

在这本专著中，以白堊乡为中心，展示了清远河流域的崛起和繁荣。白

墩乡村 400 年间的变迁故事，见证了一个“化外”之地逐渐变为中央王朝“典范”之区的过程，是明清以来韩江干流地区，以及为粤闽赣交界地域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为追寻历史，作者依时间顺序，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四个章节的叙述，探讨具有畬瑶背景的白墩地方社会，如何实现社会转型；白墩士绅如何应对社会变乱，实现“自保”，进而建构乡村社会；在康熙年间白墩士绅如何运用社会资源整合宗族社会，实行儒家化的改造，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以及乾隆年间白墩成为区域性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的过程。最后，作者认为：“白墩 400 多年的历史，是科举制度下培养的士绅，应对各个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而不断建构乡村制度的过程，是地域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映，也是国家意识在地方社会实现的过程。”

大埔县是粤东北的客家地区，阐释白墩的社会演变必然要论及客家。书中对族群的融合是结合地域历史背景，具体论述融合过程，不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层面。从白墩的历史中发现，粤东地域社会的底层文化，有着深厚的畬瑶文化传统，这个地方由官府管教不到的畬瑶之地，经过一系列变乱和官府加强控制之下，在地方士绅崛起后，逐渐接受教化，实现了社会转型，成为中央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白墩的历史实际说明，客家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科举的兴盛，并不是中原衣冠士族的遗留，而是在经历族群融合、官府平定‘贼寇’的洗礼，经过数代人的积累，‘叨受先人之积累，与父兄之教泽’，才得以实现。是各宗族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推行教化政策和地方宗族重视的结果”。（见第 415～416 页）

客家地区的古朴民风，不是中原移民的遗留，“通过白墩这个地域性的文化中心形成过程的考察，发现所谓客家优良传统，实为士绅们通过掌握的话语权，以儒家伦理为指导，变革和重新解释传统习俗的结果”。（见第 416 页）

客家地区的土堡围寨建筑的兴起，作者指出：明中叶以来，赣闽粤交界地区一直动荡不安，白墩人为了在动乱环境中生存，依据传统生存策略，修筑山寨土堡，“贼寇”来则入为防守，“贼寇”去则出为耕种。地方士绅们凭

借在地方上的声望，以及对保卫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当了修筑围楼的倡导者和修建者。

诚如作者所言，通过对白墩乡村这个典型的剖析，帮助我们进一步把握了明清时期的400年间粤东北山区的社会发展过程，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了“客家”传统社会。正是在这一时段中，“客家”由“化外”之地进入“化内”之区，足见客家起源的“本地性”是真实的，所谓“南迁”而来是不真实的。

很显然，作者是依着社会发展本来的秩序，考察社会变迁的客观过程，解释各种民间生活样式，故而关于客家、围屋、“二次葬”等都得到合情合理的评判。反之，那种从预先形成的客家概念出发，然后把古人古事放进框子里套的所谓研究，必然要与历史实际相悖。

为什么白墩村能成为粤东北山区的缩影？为什么考察的是约400年的社会变迁？为什么对“客家”需作如是观？感兴趣的读者阅读《白墩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之后，自然会有答案。

总而言之，该书通过剖析白墩村民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大致还原了这个乡村的文明进化史，而且展现出粤东北山区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阐明了国家、地方精英在乡村社会中的互动关系，是一部解读村落社会史的原创性著作。书中关于白墩乡宗族社会的建构，由“贼穴”向礼义之乡的转变，士绅在控制乡村社会中的主角地位，以及乡村社会生活的儒家化过程，都是资料翔实，论述精辟，具有学术意义。

肖文评博士能够获致这份厚重成果，还在于他一贯踏实求学，不务空言。20世纪90年代他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把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定作研究对象，一再进村采访调查，尽量掌握原始资料，体验流坑人的生活环境，有了直观感受和当地文献之后，遂能把流坑乡村、董氏家族和明清社会联系起来考察，大体上复原流坑社区的演变过程，揭示其内在原因和客观影响，写成学位论文《宗族支柱由科举到商业贸易的转移——乐安县流坑董氏宗族个案分析》，在答辩中获得好评。这次的学习实践，是他后来研究工作的基础。现

在的这本论著，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两者之间显然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解剖一个乡镇，认识社会变迁进程，从底层的人事活动中，看出国家兴衰变异的真实程度。这种由近及远、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途径，符合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它比泛论全局，八方取材，按需要选取事例，再凑合起来作总体结论的模式，更具有针对性、客观性，能更真切地表现社会演变的起伏因由。它比浮在社会上层观察，只凭朝廷文书推敲，脚不出户的书斋式研究，更具有实践性、社会性，更能清晰地再现大众的生活情状，体察到基层人群的喜怒哀乐。诚实地从事乡镇社区历史研究，既不是说大话、空话、套话，也不至于跟着别人唱戏，而是探寻当地实有的生活内涵，得到来自实践的真知，因而收获原创性成果，经得起时间检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潮，华南地区涌现出大批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学术带头人。他们在多年的耕耘中，形成团队优势，走出了一条历史学与人类学等人文社科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学术道路，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不断培育出值得敬佩的新秀。肖文评博士师从陈春声教授，在治学道路上走到今天这个阶段，正是在这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得到教导，经受熏陶，才得以健康成长起来。盼肖博士再总结提高，推出更好的新作；盼更多的同类著作接踵而至，粤闽赣客家基地逐县都有一份厚重的研究成果。到那时再来总结经验，就会有更臻完满、举世公认的真实结论。

是为序。

2010年7月22日于厦门

第一章 导 论

- 第一节 问题与学术史 / 1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基本材料 / 13
- 第三节 白墩的地理区位与政区沿革 / 18

第二章 传说与史实：以杨淮为中心

- 第一节 “铁炉坝”的传说与杨氏开基 / 30
- 第二节 “鬼子担银”的传说与杨氏的发家 / 45
- 第三节 杨淮的故事与地方社会转型 / 57

第三章 明清之际的动乱与乡村的应对：以杨士薰为中心

- 第一节 明末动乱与乡村军事化 / 94
- 第二节 清初的社会动荡与乡村的策略 / 100
- 第三节 “三藩之乱”时期士绅的举措 / 115
- 第四节 动乱之后的乡村重建 / 126

第四章 康雍年间的乡村建设：以杨之徐为中心

- 第一节 科举兴盛与教育制度化 / 143
- 第二节 人口问题与宗族的制度化建构 / 161
- 第三节 “五分均当”与差役制度地方化 / 212
- 第四节 墟市经济发展与传统生计变迁 / 225
- 第五节 变革传统与乡村习俗儒家化 / 235
- 第六节 民间信仰与仪式正统化 / 264
- 第七节 聚落格局与乡村形象的塑造 / 289

第五章 乾隆年间地域中心地位的形成：以杨纘绪为中心

- 第一节 科举鼎盛与地域文化中心 / 301
- 第二节 人口繁盛与宗族制度的发展 / 323
- 第三节 市场发展与地域贸易中心 / 341
- 第四节 社区内部关系与地域行政中心 / 361

第六章 结 语

- 第一节 体现“总体史”研究的旨趣 / 406
- 第二节 反映国家制度在乡村社会的互动与变迁过程 / 409
- 第三节 村落变迁过程是以士绅为主的
村民有意建构的过程 / 412

附 录

- 附录 1：白垵杨氏历代祖尝统计 / 417
- 附录 2：主要报告人 / 424

参考文献 / 427

后 记 / 437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与学术史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研究对象白垵村^①，在明代大埔建县前属于饶平县统辖。在地方士绅陈天资的笔下，白垵村多“梗乱”之民，是一个著名的“盗乡”。嘉靖五年（1526）^②大埔建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对其进行弹压：

饶平所统恋（洲）、清（远）之民，恃其险远，负固梗乱。正德末，益肆猖獗，屡掠近地。白垵、胡寮大乡为甚。巡抚御史熊兰，因乡官饶金等呈议，奏增县治，以弹压之。于是分清远、恋洲二都，置大埔县。^③

建县前的白垵村，因远离政治中心，地势险要，成为当地著名的“梗乱”之地。但至清乾嘉年间，白垵村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村中文人丘植动情地写道：

^① 相传因古时在村口马山上建有用白石、白色瓷土砌成的报警用的垵台，因而得名“白垵”。民国初年以后，改名为百侯。（李德礼：《大埔部分地名考》，《大埔文史》第1辑，1984年，第90页。）本文主要研究明代至清乾嘉年间的历史，因此所涉百侯地名均用原名“白垵”。

^② 为节省篇幅及避免重复，本书关于帝王年号的标注，同一页同一帝王年号，除第一次出现作注之外，余下不注。

^③ 陈天资：《东里志》卷1，《沿革纪》，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04年，第8页。陈天资，明正德年间生于饶平县宣化都上里（今大埕镇上东村）。嘉靖十四年登进士，钦选为户部给事中。后官至湖广左布政使，政绩卓著。嘉靖三十三年致仕归乡后，留心文献，采辑旧闻，搜罗逸闻，编成《东里志》。

我爱南北村，仁乡多著姓；风俗岂移人，南柔北多劲；愿言礼让崇，式里尚致敬。^①

在丘植笔中，300多年后的白墩村成为大清帝国之下崇尚礼仪、风俗醇美、邻里羡慕、多世家大族的可爱的“仁乡”。

近400年间村落社会形象的这种巨大变化，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社会变迁？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变迁？与整个地域社会的发展变化有什么关系？这是本文选择这个村落进行研究的主要出发点。

本文通过研究粤东北山区的一个乡村聚落——白墩——从明成化到清乾嘉年间近400年的发展历史，在地域社会历史的脉络中展现乡村社会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具体变迁过程，探讨国家、地方精英与乡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互动关系，因而是一个关于乡村社会变迁和建构的具有“总体史”性质的村落社会史和区域史研究。

二、学术史回顾

（一）20世纪以来的村落社会史研究

村落既是一个空间单元，又是一个社会单元，因而往往成为学者研究乡村社会的基本对象。研究村落社会史，居民、习俗、经济、文化以及与村外的关系等构成村落的基本因素，往往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因而具有“总体史”的特征。学界关于村落社会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传统人类学的村落研究

中国早期关于村落社会史的研究，是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后的产物，同时与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而研究者多为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

梁启超主张创新史学，原因是他对旧史学极为不满。他批评旧史学有四大病源，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而最为关键的，还在于历史研究究竟以少数人为中心，还是以多数人为关照。“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

^① 丘植：《槐庭诗集》，嘉庆二十五年刻本，第5页。

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故大声疾呼进行“史界革命”。^①在梁启超等学者的提倡下，研究者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村落研究是其中之一。

随着留学西方的吴文藻等引入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社区研究方法使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中国这个传统农业社会实现了结合，促进了中国村落研究的规范化和兴盛。美国学者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又译为库珀）和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农村社会调查，为村落研究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葛学溥是最早研究华南村落社会的人类学者。20世纪20年代，他依靠自己和学生对潮州凤凰村的调查，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宗族主义社会学研究》^②。他详细描述了潮州潮安县凤凰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华南的宗族结构和社会意义。至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以村落研究为单元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著作，陈达、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1934—1935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受中国太平洋学会赞助，在闽南和潮汕选择了3个村落1348户进行调查，出版了《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③。通过对婚姻、家庭、宗教信仰、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描述，分析侨乡社会的特色和社会变迁的原因。

费孝通以吴江县开弦弓村为研究对象，用功能学派的观点论述了家族、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职业分化、村落生活等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体现了整体性的有机结合。^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林耀华对福建义序和黄村的研究。在对义序进行研究而写成的《义序的宗族研究》中，详细地分析了福建村落中宗族祠堂及有关的宗族组织在村落社区的社会功能。认为宗族祠堂是宗族的外显性符号，是团结宗族的强有力的核心，祠堂组织在村落中具有宗教、社交、娱乐和法律等功能。此书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学学者以参与观察法研究

①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6页。

② Daniel Harrison 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Volume I Phoenix Villa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City, 1925; 周大鸣译：《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宗族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

③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

④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